世界文學時代的來臨

張隆溪

許多人以為德國大詩人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是造出「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 這個術語的第一人,其實不然,因為在歌德之前的德語文學裏,早已有人使用這個概念,但的確是歌德最先使「世界文學」成為文學研究中一個新概念①。在十八與十九世紀之交的歐洲文學和文化中,歌德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影響,他關於「世界文學」的論述受到普遍重視,並使這一概念在我們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成為這個全球化時代學術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1827年1月31日,歌德在與年輕的秘書愛克曼 (Johann P. Eckermann) 談話中,說他剛剛讀了一部中國小説的譯本,覺得既陌生又親切,於是他深信「詩是全人類共有

的……世界文學的時代就在眼前,我們每個人都應該促成其早日到來」②。歌德在他那個時代,的確是視野開闊、目光遠大的一位巨人,他不僅繼承了西方自希臘羅馬以來的文學傳統,而且對歐洲之外的阿拉伯文學和東方文學都深感興趣。他自己就曾有感於古波斯詩人哈菲茲(Hafez)作品的魅力,創作過一部《東西方詩集》(West-östlicher Divan),又對印度文學,尤其是迦梨陀娑(Kālidāsa)的著名詩劇《莎恭達羅》(Śakuntalā)非常推崇,而他提出世界文學時代來臨,則是閱讀了中國文學作品之後的感想。

庫爾裘斯 (Ernst R. Curtius) 在他那部 具有經典意義的文學批評名著《歐洲文學 與拉丁中世紀》 (Europä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elalter) 結尾處,提起歌德的「世界文學」觀念,認為「我們也許只是處在那一過程的第一階段。我深信在這發展之中,美國將起重要作用。我相信T. S.艾略特是從印度思想汲取靈感的第一位詩人」③。庫爾裘斯此書初版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1948年,在學術和其他方面,他對美國都寄予厚望,然而在二十世紀的西方,所謂「世界文學」其實遠遠沒有達到歌德當年心目中所想見的"Weltliteratur",因為歌德那種世界主義 (cosmopolitanism) 在二十世紀後半並非思想界的主流,而英美學界所謂「世界文學」基本上是以歐洲為主的文學。這從美國出版的幾種主要的世界文學選本裏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影響很大的《諾頓世界文學名著選集》(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Masterpieces),1995年以前的舊版只包括從希臘羅馬文學、《聖經》、中世紀文學、文藝復興到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文學,再到現代文學的名著,全都是西方著作。這種情形,到1990年代後期才有明顯的改變。

自1960年代以來,西方文學研究進入理論的時代,從形式主義、結構主義、 讀者反應批評,到後結構主義或解構主義,然後到女權主義、後殖民主義,同 時逐漸由文學理論轉入文化批評,討論的問題愈來愈離開文學本身,而關注社 會政治和意識形態問題。文學研究這一發展過程產生出的兩個結果,與當前世 界文學研究之興起直接相關。第一個是西方文學和文化理論很強的自我評判傾 向,使西方學者對西方中心主義作出尖鋭的批判。1980和90年代,西方文學與 文化批評對西方經典產生普遍懷疑,出現了所謂「去經典化」(decanonization) 傾 向,而與此相應的一個趨勢,就是對西方傳統之外的文學和文化的興趣日益增 長,很多研究者和學生都對非西方文學產生興趣,這就為歌德所謂「世界文學」 觀念在今日之實現,提供了比以往更好的環境條件。我們也可以説,經過了自 我批判理論洗禮的西方文學研究,現在才返回去認識到歌德在十九世紀早期提 出那個「世界文學」觀念的價值。文化環境的這一改變很快就反映在圖書出版和 市場營銷方面,1995年之後出版的《諾頓世界文學名著選集》和其他幾種類似的 選集都選收了許多非西方文學作品。如1997年出版的《諾頓世界文學名著選集》 單卷本就以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史詩《吉爾伽美什》、古埃及文學和《聖經‧舊約》 開始,然後有古希臘文學、中國《詩經》、《論語》和《莊子》選段,其他不同時代 的非西方文學還有印度、日本、阿拉伯文學作品,直到包括魯迅的《狂人日記》 等近代作品。

西方文學和文化批評在最近二十多年發展的第二個結果,就是理論逐漸取代了文學,造成文學研究深刻的「身份危機」(identity crisis)。如果説形式主義和結構主義還主要討論文學和文學語言,到後結構主義或解構主義就愈來愈抽象虚玄,不僅生硬的批評術語佶屈聱牙,而且在很多人寫的文學批評論文裏,哲學、語言學、人類學、心理分析等各種理論取代了具體文學作品的討論,就像任教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以研究《聖經》文學著名的阿爾特(Robert Alter)所說:「目前在我們最著名大學的英文系或法文系獲取學位的很多年輕人,每讀

過一頁喬治·艾略特或斯湯達,就會讀兩頁拉康、德里達、福柯和克里斯蒂娃。」④耶魯大學教授凱南 (Alvin Kernan) 在1990年出版了《文學之死》(The Death of Literature) 一書,批評在1970和80年代流行的各種文學理論如解構主義、女權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等,「有如一群毀滅天使,致力於文學之死,他們盡力表明本來就無所謂文學,一般以為詩人寫詩,其實完全不確,文學過去只是男人壓制婦女、或資本主義剝削人民群眾的工具。」⑤ 英國批評家凱慕德 (Frank Kermode) 在1967年著有《終結的意識》(The Sense of an End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Fiction) 一書,對於二十世紀文學理論的發展很有貢獻,但他看見理論發展脫離了文學,而且以一套帶有強烈政治和意識形態色彩的理論否定文學時,便毫不掩飾自己的厭惡。他在2000年出版《莎士比亞的語言》(Shakespeare's Language) 一書,開頭就明言⑥:

我特別反感現代某些對莎士比亞的態度,其中最壞的一種認為莎士比亞的名聲是騙人的,是十八世紀一個民族主義或帝國主義陰謀的結果。與此相關而且同樣自以為是的一個觀念,就是認為要理解莎士比亞,就必須首先把他的劇作視為與他那個時代的政治話語密切相關,而這種關聯又只是現在才看得出來的。仔細看來,這類貶一貶莎士比亞的做法如果說還有一點意思,也只是證明了批評家不斷需要找一點不同的話來說,而說的也是他恰好感與趣的話題,而不是莎士比亞的文字,因為如我所說,他很少會援引莎士比亞的文字。這類標新立異的批評語氣都相當自信。這些批評家們需要把自己的看法說得超出許多前人,而一般說來,這些前輩的資歷又是他們不好去挑剔的。他們不能不把約翰生、濟兹和柯勒律治(姑且只舉三位)都說成是帝國主義洗腦的犧牲品。當然,既然你能把莎士比亞貶得一錢不值,要貶損這幾位以及類似的權威,那就更不在話下;尊重他們就只是盲目接受資產階級評價的又一個例證而已。不過到頭來,你除非廢除了文學這個觀念本身,否則還是不可能除掉莎士比亞。

批評文學理論脱離了文學本身,並不僅僅來自原來就以文學研究知名的老一輩學者。在這方面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英國馬克思主義批評家伊格爾頓 (Terry Eagleton),他1983年發表的《文學理論》 (Literature Theory: An Introduction) 一書,當時幾乎成為大學文科學生追捧的校園暢銷書,對文學理論在英美學界的推進起了很大作用。然而二十年之後,他發表了《理論之後》 (After Theory) 一書,對許多脫離實際而反映中產階級墮落價值觀的所謂「文化研究」,尤其對性和同性戀表現出特別興趣的所謂「性別研究」,作出十分尖銳的批評。伊格爾頓說:「在某些文化圈子裏,手淫的政治遠比中東的政治更有吸引力。社會主義已經讓位給性虐待狂和性受虐狂主義。在研究文化的學生們當中,身體是一個極為時尚的課題,但通常是情欲的身體,而不是餓得瘦骨嶙峋的身體。他們感興趣的是在性交的身體,而不是在勞作的身體。說話輕言細語的中產階級學生們聚在圖

書館裏用功,研究的是如吸血和挖眼,機械人 (cyborgs) 和色情電影之類極具刺激性的題目。」⑦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則是2006年出版的《在一個全球化時代的比較文學》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這本書,它是美國比較文學學會 (Americ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ACLA) 總結前此十年研究狀況的報告,在美國比較文學甚至一般文學研究中,都具有相當的權威性和影響力。書中由蘇源熙 (Haun Saussy) 執筆的主要一篇報告就詳細説明,由於文學理論在1980和90年代過度發展並脱離了文學本身,比較文學已面臨一個身份認同的危機。蘇源熙説⑧:

不管「語言學家」這個詞過去的含義是甚麼,現在做一個語言學家,你其實不必懂很多語言:在過去的五六十年裏,語言學已經發展出一套自足的研究項目,而不必在那樣一個細節的層次上去實際接觸語言。同樣,在過去幾十年裏,你似乎可以以文學研究為職業而無須不斷提到文學作品:你可以研究美學理論、文學史、文學的接受、教學,甚至文學理論史,把這些都作為各自獨立的領域來研究。

1970和80年代,美國大學裏的比較文學系往往最先接受和研究大多來自歐 洲、尤其是法國的批評理論,然後這些理論又逐漸被其他人文社會學科吸收。 可是當比較文學講那套後現代和後殖民理論擴散到其他領域,當歷史學家、社 會學家、人類學家都講那套理論,而研究文學的學者卻不談文學時,比較文學 的獨特領域又在哪裏呢?「比較|本來就不是比較文學的專利,一旦沒有了「文 學」,比較文學更失去了自身的特性,出現了身份認同的危機。由此可見,回到 文學去是文學研究往後發展必須踏出的一步。ACLA報告提出重新思考「文學性」 問題,認為「文學性的模式特性使之既有活力,又不受環境支配,而一個具有擴 展性質的研究題目就正應該如此|②。在筆者看來,最近數年愈來愈引人矚目的 世界文學研究,就是回到文學去的一個途徑,是文學研究的新方向,尤其是比 較文學未來發展的新方向。要解決文學研究身份認同的危機,就必須回到文學 去,這是一個必然趨勢;而打破歐洲中心主義的傳統局限,就使這一趨勢不可 能只是返回過去那種純粹歐美文學的老路,而是走向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文學, 這就為文學研究打開了無比廣闊的新領域。與此同時,世界文學也使文學研究 得以擺脱充斥在各種後現代、後殖民理論以及文化研究領域中的身份認同政治 (identity politics),重新回歸文學及文學之鑒賞和批評。

在我們這個時代,究竟甚麼是世界文學呢?美國著名學者丹姆洛什(David Damrosch)發表於2003年的專著就做出了回答。他從歌德的「世界文學」觀念談起,特別注重討論非西方文學作品,為世界文學在當前的興起作出了很大貢獻。他給「世界文學」下了一個定義:「世界文學包括超出其文化本源而流通的一切文學作品,這種流通可以是通過翻譯,也可以是在原文中流通(歐洲人就曾長期在

拉丁原文中讀維吉爾)。在最廣泛的意義上,世界文學可以包括超出自己本國範圍的任何作品……無論何時何地,只有當作品超出自己本來的文化範圍,積極存在於另一個文學體系裏,那部作品才具有作為世界文學的有效的生命。」⑩這個「世界文學」觀念強調的是必須超出單一語言和文化的民族文學傳統,於是翻譯和流通就成為構成世界文學必須的兩個重要因素。換言之,世界文學就是超出本民族語言和文學傳統的範圍,在世界其他地方流通並得到讀者閱讀和接受的文學作品。

世界文學在當前的興起將提供許多機會,使具有悠長傳統的中國文學得到世界其他地方讀者的接受和喜愛。自歌德的時代以來,尤其在近一二百年中,東西方政治、軍事和經濟力量的懸殊也造成文化力量的不平衡。一個中國的普通大學生大概都知道西方文學主要的作家和作品,至少知道荷馬、但丁、莎士比亞、歌德、巴爾扎克、狄更斯、托爾斯泰等一大串作家的名字,可是一個歐洲或美國的普通大學生也許聽說過孔子,知道有佛教和道家,但中國文學中最著名的作家和詩人的名字卻絕不是他們常識的一部分。由於筆者在上面講過的原因,這種情形現在有了改變的可能,這是我們應該感到歡欣的。現在我們看到,一個名副其實的世界文學的時代即將來臨,就像當年歌德所呼籲的那樣,我們每個人都應該促成其早日到來!

註釋

- ① 參見John Pizer, "Johann Wolfgang Goethe",未刊稿。此文將作為一章,收在David Damrosch, Djelal Kadir和Theo D'Haen三人編輯之新書*Ro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裏發表。
- ②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Conversations with Eckermann (1823-1832)*, trans. John Oxenford (San Francisco: North Point Press, 1984), 132.
- Ernst R. Curtius,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 trans. Willard
 R. Trask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597.
- Robert Alter, The Pleasures of Reading: In an Ideological Ag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9), 11.
- S Alvin Kernan, The Death of Literatur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45.
- Frank Kermode, preface to Shakespeare's Language (London: Penguin, 2000), viii.
- ① 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2-3.
- 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4.